

林徽因与她的时代



《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
于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6月

梁启超真好、林长民真好、梁思成真好、沈从文真好、费慰梅真好……林徽因真好。

阅读《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看见的不只是林徽因，而是一个时代，是这些让我感叹“真好”的人们。

作者于葵，林徽因的外孙女、梁再冰的女儿。家族后辈写敬仰的先人，有美化的滤镜，回避了某些复杂的人事纠葛的讲述，然而，初衷

“是为了缅怀亲人，表达思念”这样的书写，呈现了一种澄澈的、纯净的表达，有赖于作者的真情、审慎与克制的态度，它的确是要“带给读者一个既不被无限虚夸、也不被恶意贬损的林徽因”。

全书有许多内容之前未见。由于作者身份特殊，她能获取梁、林家族及其同时代人许多原信、原稿、照片或各种遗物，这是其他传者没有的优势，这部传记的影像记录给人以琳琅之感；同时，作者也得以拥有多重视角，既有家人的，有其他亲友和研究者的，也有林徽因自己的文字或“自述”，三者融汇，凸显了这部传记的最大特点——真挚。

唯有真挚，最能配得上对林徽因的讲述；唯有真挚，最能让读者沉浸于情感的氛围，更进一步去深思：是什么造就了林徽因？

铸造林徽因人生底色的，离不开“两位父亲”的悉心教导和爱护。林长民1920年携林徽因游历欧洲的日记始终保存于家中。林长民的艺术气质和文化底蕴，对女儿有很大的影响，家学的熏染、父亲的传授，对日后成为建筑师和诗人的林徽因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如今后世子孙拥有的珍贵的家族遗产。林长民遇难之后，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要他“慢慢地拿

达观的道理安慰他(她)”，拳拳心意，溢于言表。未来的岁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将遭遇无穷的厄运，而早年梁启超恩重如山的关怀，始终是他们婚姻的强大支撑。

林徽因立志成为一位中国女建筑师，可是将梦想变为现实并非易事。当时整个世界都没有女性从事建筑专业的观念，林徽因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拒之门外，她只能以报考艺术专业并选修建筑的方式，辗转达成自己的学业目标。多年以后，林徽因诞辰120周年前夕，一则新闻告知公众：5月18日，宾夕法尼亚大学韦茨曼设计学院在2024年毕业典礼上正式向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于葵代表林徽因接收了证书。这份迟到的认可，既是对林徽因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学先驱的表彰，也是对所有被忽视的女性成就的弥补。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加入了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营造学社，从头创建中国建筑学体系。筚路蓝缕，行止艰险，他们奔波在路上。交通不便，住宿肮脏，饱受虱子、跳蚤侵扰，连口清水都喝不上。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梁、林完成了《宝城县广济寺三大士殿》等报告，为中国建筑田野调查树立了典型。身逢乱世，

危在旦夕。“七七事变”，京城沦陷。梁、林携家带口，暂居长沙。敌机来袭，家园化作废墟，炸弹与残肢纷飞。梁、林只得继续南下，行至滇境，与流亡至此的中国学人汇合，赓续学脉，共建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一穷二白，林徽因以孱弱的病躯参与中国建筑研究和古建筑保护的事业之中，身处逆境仍然坚守风骨，凸显了她那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使命感、积极的能动性。

《山河岁月》共计43.5万字，又夹杂着很多图像资料，是一部详实的大传，突出了林徽因的事业成就、风骨气度和家国情怀。同时，它也是一部“小传”，穿插描述了家庭成员相处的各种细节，温暖动人，情真意切。于葵写了很多“母与女”的故事，像曾经林长民对待林徽因那样，林徽因也平等对待子女，在梁再冰幼小之时，就把她当作知心朋友对话、交流，小再冰既有可爱纯真的一面，又能担当家庭的责任，成熟稳重，这是林氏门风的遗存，也是给我们读者的启示：为人父母，为子女长远计，该怎么做？

这些难得的日常片段场景，逐渐组合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林徽因，书中还有很多诗文选段，可以直观感受林徽因的风采。这也是我极力推荐大家读这部传记的原因。

林颐

美术史里看汉风飞扬



《徐州美术史》
王雪春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年10月

人们津津乐道。种种惯性思维加上地域偏见，遮蔽了人们审美的眼睛，以至于徐州的文化成就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实际上，“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强之气与“郁郁乎文哉”的艺术氛围并不矛盾。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徐州地区的美术都在江苏省乃至全国的文化版图有着独特的地位，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光芒未能被社会广泛认识。数十年来，学界对徐州美术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大多体现为当代艺术家个案介绍或专题类研究，缺乏一部能全面、系统反映徐州美术历史面貌的大型文献。

《徐州美术史》以50万字、数百幅图片的规模，勾画出徐州美术的演进历程，呈现了徐州美术独特的内蕴。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既是一部区域造型艺术的历史图册，也是学者们对区域美术理论思考的结晶，更是人们深入了解徐州文化的重要窗口。展卷阅读，不难发现这部著作的可圈可点之处颇多。

《徐州美术史》是一部区域美术专门史，也是一部区域美术通史。“通史”是相对于“断代史”而言的一种叙述体例，其特点不仅体现为年代的连贯性，还要“通古今之变”——反映事物的赓续和嬗变。在这部著作的开篇，研究者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由此探徐州美术之源，随后叙述其流变，历经石器时

代、青铜器时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结束于20世纪。这部通史时间跨度很大，按时间顺序分为七章，夹叙夹议，人们读起来有一气呵成之感，从而对徐州美术的传承脉络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反过来，不同年代的美术遗珍，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时代的更替和社会风云的变幻，发人深思。

《徐州美术史》学术构架合理，内容丰富多样。作者遵循着美术史著作的常规做法，按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不同门类展开阐述，史论结合，言必有据。虽然徐州美术的发展与演变在总体上保持着连续性，但在历史长河中，不同门类往往此消彼长，其演进线索也时隐时现、时断时续。著者尊重史实，在写作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章节的安排亦基本合理，读起来能感受到一定的节奏感。比如，在某些历史时期，画像石、陶俑、佛教造像遗存丰富，考古成果丰富，书中对此着墨多，分析也很深入；历史上徐州书法成就斐然，于是书中对此也进行了重点阐述，相关文献考据准确可信，对具体书法作品的分析也很精到；徐州近现代的绘画及美术教育成果显著，影响广泛，于是书中对此的论述也很充分。上述内容，都是这部著作的亮点，值得读者细心品读。书的第七章还专门辟出一节阐述徐州现当代的

民间美术，包括泥塑、面塑、玩具等。这些品类基本上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是地域文化多样性中最富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部分内容，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徐州乡土文化的特色和审美心理。乡土文化朴素而充满生机，它其实也是徐州美术的另一个“源”。

《徐州美术史》的学术视野开阔。这部著作的落笔点固然在徐州，但作者没有就徐州论徐州，而是在以徐州为基点，观照淮海地区、全国甚至海外，分析徐州美术与周边地区文化的相互影响，论述文化个性与共性、文化差异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种种关联。比如，在阐述近现代徐州美术时，书中认为，徐州美术社团的涌现与国内的社会变革、西方思潮的影响有关，同时也指出，徐州美术社团“对民国初期的美术运动和美育创新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社团通过师徒传承和核心影响，进而构建起一个具有辐射关系的地域性美术精英群体，为地方‘书派’‘画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民国及现代画坛格局产生了世纪影响”。这些观点，都颇有见地。

《徐州美术史》的著者探幽发微，搜妙寻珍，为“人文徐州”留存了一份造型艺术的历史档案，也让人们认识到该地区美术遗产的价值。

徐沛君

晚清如何书写西方



《远西旅人》
皇甫峥峥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

在《远西旅人》一书中，美籍华人、历史学者皇甫峥峥考察了六个不同身份(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的旅西使臣遗留的文字，从传媒学角度对晚清与西方建立外交信息体系的过程做了深入调查与建构。可以说，该书的写作目的很好地回答了一个问题——“晚清是如何书写‘西方’的？”

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上世纪，哈佛

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就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型，在这一模式下，晚清中国受西方技术思想的冲击，展开了对西方的回应，最终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外交体系。这种模式将中西方放在了二元对立的位置，中方显得相当被动，而受其影响，晚清人对西方的论述，常常被断章取义，很少有人注意其中内涵的丰富信息。

皇甫峥峥没有接受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范式，她具备宏观的观察能力，同时采纳了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东西方的相互接触，通过个体的行为，重构历史的细节。

明治维新后，日本翻译了很多西方经济、哲学、新闻、国际等方面的著作，里面有大量在东方从来没有过的新词。比如，革命、民主、经济、艺术、社会、干部等词汇，就是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留学东瀛时转译过来的西学新知，后来经历了大范围的使用和推广，这些“和制汉语”悄然汇入了现代汉语体系，我们常年浸润其中而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外来的事物。

在皇甫峥峥看来，日本的确主导了20世纪初西方知识向中国的传播，但在1895年之前，来自日本的影响并不是清朝文人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主要渠道，晚清文人对西方文化的自觉能动反应，也远远超过费正清的“冲

击—回应”模式。清代涉外人士如何“书写”西方、诠释西方？皇甫峥峥力图通过他们的活动揭示他们所经历的流动性、异质性和矛盾性。

这本书抓住了历史的重要节点。作者指出，晚清的总理衙门是获取信息的主动方，这一机构赋予了“开眼看世界”的人们以新的使命——将未知的、源自西方的概念，整合进已有的、属于自身的信息框架中。书中六位使臣对自身责任与西方世界的不同看法，反映了这一使命的不确定性，而其思想的转变与外交体系的日趋成熟，正是整合信息框架的成果。

以第四章所描述的对象——身为学者的郭嵩焘为例，他曾多次担任英、法、俄等国的外交公使，对西方外交体系与语言框架有着深刻认识，但在其笔下，亦不乏现在看来不妥乃至荒谬的内容，比如，对殖民体系的道德赞扬与对国际法理解的局限性。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使得改革者视他为旗帜，但郭嵩焘认知上的偏差，却很少有人去发掘原因。作者指出，以往的研究者忽略了一个事实，郭嵩焘是王夫之的狂热崇拜者，深受王夫之反对专制思想的启发，因此，他对西方思想的理解是理想化的“六经注我”，将西方的崛起与

传统天命论下的道德使命混为一谈。郭嵩焘的例子，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翻译给出的，总是自己所期望的意思。

随着“使西”这一制度的日趋成熟，使团成员的日记愈发表现出私人化、琐碎化的趋势。在作者看来，这可能是保守退行的表现——中国人不再热衷于了解西方的事务。作者以最后两章的内容，通过对曾纪泽、薛福成两位重要人物的介绍，试图解释原因——恰恰出自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例如达尔文思想在社会学领域的扩张，严重刺激了薛福成所代表的中国战略家的心理矛盾，既对西方的战略扩张深恶痛绝，却又主张利用新的外交和领事机构在亚洲建立自己的帝国，以“适者生存”解释殖民扩张的历史影响、必要性与紧迫性。

该书突破了旧有史观的桎梏，作者将个体的故事放在了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对“文化相遇”这一事件做了“历史化”的处理，由此得出了多样性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又引出了新的问题。诚如结语所言，这是对“另一种叙事”的尝试，而这样的尝试，为我们重新认识近代化的历程、重新理解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无疑带来了相当重要的启示。

赵昱华